

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asics And Advances**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

第1辑

基础与拓展

荆学民 ◎ 主 编
白文刚 苏 颖 ◎ 副主编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asics And Advances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 第1辑

基础与拓展

荆学民◎主 编

白文刚 苏 颖◎副主编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基础与拓展(第1辑)/荆学民主编,白文刚、苏颖副主编.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657-1667-6

I. ①中… II. ①荆… ②白… ③苏… III. ①政治传播学—研究—中国 IV. ①D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7948 号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基础与拓展(第1辑)

ZHONGGUO ZHENGZHI CHUANBO YANJIU:JICHU YU TUOZHAN(DIYIJI)

主 编 荆学民

副 主 编 白文刚 苏 颖

责任编辑 吴 磊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封面设计 拓美设计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41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667-6/D·1667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发刊词

◇ 荆学民

无论现在我们怎样理解和定义政治传播,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政治传播是人类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类政治生活基本的重要活动。或许是由于涉及“传播”,人们很容易把对政治传播研究的视线聚焦于传媒技术的发展,据此,才有了西方的以大众媒介为核心要素并将其投放于竞选性政治而形成的西方政治传播观;也据此,人们有意无意地就以西方这种政治传播观来评判西方以外的政治传播;进而据此,在中国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有政治传播,或认为中国的政治传播不是政治传播。

但是,当我们把思维逻辑倒推到“人是政治的动物”,因政治的“公共性”的“元本质”又意味着“传播”——人的“政治性”与政治的“传播性”二者同一的时候,才是我们思考和研究人类政治传播的逻辑起点。坦率地说,从这里起步,才能把握“政治”和“传播”的精髓,否则,也就是在浮于表面的“政治”和“传播”的皮毛上打转。如此一来,政治传播便不能以现代西方的政治传播为标本,应有更高的视野和更深的锐度来公平地研究政治传播。唯其如此,在现在的中国,研究政治传播才有根基、才有意义,否则,我们岂不都是堂吉珂德战风车?

事实上,从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进步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所依托的“政治”,虽不能像经济奇迹那样以“一花独秀”来标榜,但至少需要我们摒弃固有的偏见来认真审视这个不争的事实。这就既需要总结以往基于这种政治的政治传播,更需要建构未来更符合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要求的政治传播,以从历史通过现实而走向未来的合力形态,在人类政治文明的体系中不断刷新自己的存在与贡献,这才是现在的中国从上至下、从官到民、从理论界到业界政治传播高温不退的真正原因。

说到现在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因为一拥而上,所以看起来似乎雾里看花一片茫茫。全球政治风雷卷动,中西古今理论丛丛,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及理论似乎无所适从。以我观之,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的困境有两大方面。

第一,中国的政治体制独特,若坚守上述那种西方政治传播观,中国就只有政治宣传,还谈不上西方那种意义上的政治传播;但如若超越西方政治传播观,视中国的政治宣传亦为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多态政治中的政治传播,那么,接着而来的困境就是,如何使中国的政治宣传转型为更适合现代政治,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政治的新型政治传播?政治宣传在中国首先是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惯性和穿透力的实践问题,其次才是理论问题。因此,“转型”所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绝非诺诺理论研究者所能承受。

第二,理论研究者天然的本性是把研究对象与已有的且认为比较好的样本作比较。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目前就是这样,研究者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与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进行比对、判断、批判。因为面对的政治现实不一样,所以这种比较就只能停留在理念、理论和研究的方法论上。不能直面自己的现实进行原创性的研究,而只用拿来主义进行照搬和比对,这也不能算有错。那我们就聚焦于目前所陷入的方法论困境。众多的眼花缭乱的“方法”我们在此姑且不论,就说对于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具有“标本”地位的“理论与实证”的方法论困境。现在,一个有影响观点认为:与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相比,我们只会空洞的理论研究,而不会西方那种纷繁复杂的实证研究,进而认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乏善可陈,没有前途。殊不知,对于政治传播来说,首先是通过“玄学”确立核心政治价值观,之后通过“技术”进行着力传播。以美国为例,它的政治建国形式和机制,同时基本完成了它的政治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因此,它的政治传播研究的优势尽显在其“实证”研究上。有美国学者认为,他们是在价值观上没有什么要通过理论论证而完成的事了,无聊,才去“混碗饭吃”去搞实证研究。而我们中国却相反,正是需要“玄学”的理论论证来创造、选择、构建和完成自己核心的政治价值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不是不需要实证研究,而是还没有到最需要的时候,至少我们在效仿各种先进的实证研究的方法论时,不要妄自菲薄而忽略最基本的基础研究。

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困境很多,任重道远,以上仅举二例论之。走出诸等困境,固然所谓的“策略”很多,但主要还在于明晰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对象、基础、轴心和边界。这里借助于发刊词,仅只表明我们关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当然,这种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只有在更为自由和广阔的学术场域和学术家园中才有意义。这正是我们筹办这份刊物的初衷。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成立之时,虽不能当时就有如此的时代、学术及理论的自觉,但也着实立足于望眼可及的时代需求。经过几年的艰辛努力,研究所终于在新时代中国政治传播越来越迅猛的大潮中立足于推力弄潮之地,参与到全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大军之中,对中国形态的政治传播研究努力贡献一份力量。

春暖花开,东风劲吹。2015年5月16日,“首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操持召开。论坛部分依托了研究所获批的中国第一个以政治传播为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已有研究成果。领域拓新、选题新颖、内容充盈、学术纯雅,是论坛的写照。

呈现在诸君面前的便是以论坛为基础的研究成果的结集。从更长远的战略考虑,我们决定把之后的研究成果以固定的节奏推进,即连续结集编辑出版,故命名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第1辑)。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份展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精品的学术刊物。

敬望诸君不嫌茅庐之陋,赐予精品精华。

目 录 Contents

首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主题精粹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成果反思与范式选择 荆学民 / 3

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 俞可平 / 6

政治传播视野中的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研究 孟 建 于嵩昕 / 9

中国政治传播的全球意义 严文斌 / 13

意识形态在政治传播中的样态 施惠玲 / 16

政治的传播与传播的政治辨析 姜 飞 / 19

中国政治传播思维的转变与优化 陆小华 / 22

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变迁与传播 佟德志 / 25

历史视野中的政治家形象 张 昆 / 28

中国政治传播话语创新的机遇与挑战 于运全 / 31

“依法治国”话语的跨文化传播 程竹汝 / 33

从习近平讲话看政治话语创新 郑 剑 / 35

政治传播理论研究

政治形象传播:建构与重构

——新媒体语境下领导人的形象传播策略研究 郎劲松 侯月娟 / 39

中国形象研究的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 董 军 / 48

政策解读的传播模式与传播效果评估研究 于 晶 杨 晨 / 61

受众的再现

——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中的大众、精英与公民 王 健 / 72

近三十五年来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概览

——“政治传播”主题学术论文数据可视化视角下的观察 周 辉 / 81

政治传播实践研究

论政治传播中的话语构建

——以大跃进运动为例 许 静 / 97

毛泽东、内部参考与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 刘宪阁 / 107

情感把关与制度管控:朝鲜战争前线的中国战地记者 张 放 / 118

中国政治动员宣传:从王朝动员、农民造反到中共革命 刘 朋 / 128

论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转变的基本逻辑 李宗建 / 137

政治传播视域中的领导人形象及其摄影呈现 汤天明 / 145

《新闻联播》的政治传播模式分析 邵梓捷 张小劲 孟天广 / 154

弥赛亚主义:苏联政治传播中的东正教传统及其转化 潘祥辉 / 173

政治传播与新媒体研究

新媒体与政治思想传播的三对张力 李彦冰 孟艳丽 / 189

微传播监视的政治与社会分析 谢进川 / 196

论自媒体传播场域话语权的颠覆、同构与构连 许同文 / 203

YouTube 政治视频的生产情形 冯丙奇 王 杰 李沛儒 / 212

政治传播视域下的社交媒体传播

——以“阿拉伯之春”为例 韩 娜 / 221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成果选粹

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 荆学民 李海涛 / 231

政治传播中的话语与意识形态 施惠玲 / 241

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内涵与本质 刘小燕 / 247

新阶段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性思考 姜 飞 / 257

论制约当代中国政治传播能力的政治文化因素 白文刚 方 飞 / 267

舆论领袖的失灵

——当代中国政治传播中介链条的断裂 苏 颖 / 274

政治传播语境下政治人物公众形象的建构

——基于建构主义的一种分析 源 贞 / 283

书 评

活动论：政治传播研究新视角

——评荆学民教授所著《政治传播活动论》 李 智 / 291

在中西古今中求索学与术

——评白文刚新著《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 张露璐 / 295

国家形象传播研究的创新与超越

——《政治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书评 祖 昊 / 301

首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主题精粹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成果反思与范式选择 /荆学民

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 /俞可平

政治传播视野中的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研究 /孟 建 于嵩昕

中国政治传播的全球意义 /严文斌

意识形态在政治传播中的样态 /施惠玲

政治的传播与传播的政治辨析 /姜 飞

中国政治传播思维的转变与优化 /陆小华

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变迁与传播 /佟德志

历史视野中的政治家形象 /张 昆

中国政治传播话语创新的机遇与挑战 /于运全

“依法治国”话语的跨文化传播 /程竹汝

从习近平讲话看政治话语创新 /郑 剑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成果反思与范式选择

◇ 荆学民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筹办这个论坛,是基于当下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风生水起的大背景,是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正当春风劲吹时的召唤。2011年我们拿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历时四年,全方位展开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现代传播》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丛书”4部。今天召开这个高端论坛,总结与反思如下。

第一,提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必须实现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应该说,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制约政治传播研究,尤其是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深入推进的障碍。学者们对于政治传播的研究形成了政治学视野与传播学视野的“两条平行线”,依据各自的理论特性和方法论优势形成突兀的“壁垒”。正因为如此,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传播领域和问题上,政治学与传播学相互“推让”,双方缺场,形成了空白或者“虚场”。基于此,我们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对“政治传播”概念进行新的界定和论证,提出“政治传播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这个界定内在融合了政治学与传播学,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政治传播的研究对象、基本范式、基本命题、基本原理以及基本规律,将是一个具有前提可靠、内涵稳定、边界清晰的政治传播系统。在对政治传播进行概念的界定之后,我们进一步对诸如“传播生成社会”“政治统摄传播”等重要基础性命题进行了学理性论证。至今,我们的学术观点在政治传播的学术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奠基和引领作用。

第二,提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三阶段说”。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具有独特性,一些学者套用和照搬西方政治传播的样态和标准,甚至认为中国只有政治宣传没有政治传播。我们认为这显然是一种偏见。据此,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传播研究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和评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三阶段说”。“三阶段说”借鉴了英国学者杰·G.布拉勒姆和丹尼斯·卡瓦纳对西方政治传播研究“三代说”的方法。国内有学者把“三代

说”直接套用到中国,提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所谓“三代说”,但却明显牛头不对马嘴。西方的“三代说”以选举政治为环境,研究人群性质为基准,以传媒技术发展为载体,这一切是无法对应在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上的。因此,我们提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第一个阶段是政治宣传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政治传播(狭义)阶段,第三阶段是政治传播新拓展阶段。当然,可以看出,这个划分是很多条件约束下的无奈的表述。此后,我在此基础上,区别了狭义和广义的政治传播,并进而把侧重于纵向描述的“三阶段说”规范为纵向与横向一致、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政治传播三大形态:“政治宣传、政治沟通、政治营销”,可谓政治传播的“三形态说”,现在正在进行深入的论证。

第三,深度提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基础、轴心与边界。在现代人类的政治文明碰撞砥砺和交汇融合的浪潮中,中国的政治文明以自己特质为人类的政治文明进步作出了世人瞩目的贡献。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代表会议之后,新的中央集体提出了中国梦的伟大政治理想,经过持久不懈的诠释、传播以及坚定不移的种种行动,中国梦在全世界产生了难以抵挡的政治影响力,乃至美国新一届的总统选举希拉里也打出“相信美国梦”的旗帜来对接中国梦。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不搞竞选式的民主政治。这一点就决定了基于选举政治之上的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有限性,西方很多的政治传播理论很难在中国政治的生态下去展开和发挥作用。以中国特色政治文明为基础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轴心,势必围绕着中国政治宣传的改善、提升和转型而做文章。尽管学界对政治宣传有这样那样的批判和看法,但是我们觉得在中国研究政治传播,如果你不敢正面去触及和研究政治宣传,就无法想象其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据此而言,我想继续重申的是,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虽然在眼下的中国论语广阔,但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奠定了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的基础。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基础的不同决定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整个政治传播的性质与形态的不同。如果将政治传播窄化为传播,或者继续机械简单地套用新兴媒体之传播理论,这样的结果无益于有效满足中国当下对于政治传播理论的急迫需要。基于此,我们渴望政治学对于政治传播研究的积极关注和深度介入,当然也渴望传播学对于政治传播研究优势的保持、深化和拓展。

第四,引领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自觉。方法论主要由学科理念与研究范式构成。由于政治传播横跨政治与传播两大领域,甚至不限于这两大领域,所以既导致了各个学科蜂拥而上、各显其优,又导致了研究对象和领域的断裂以及聚焦分散等等。目前最突出的一个断裂带是:政治学着眼于党和国家高度的理论战略层面,展开诸如国家传播战略、国家想象构建、政治文明诠释等宏观而抽象的理论研究,传播学着眼于传播技术和技巧的策略层面,展开诸如新兴媒体时代的微博、微信传播,草根政治生态中个体的政治参与等微观而具体的实证实验研究。两大层面的区隔与断裂决定了对政治传播研究特别是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方法论自觉和研究范式选择的重要性。这篇短

文略举其要：一是超验与经验相统一的范式。人类政治文明的坐标选择与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需要用超验与经验相统一相结合的范式来诠释和传播。纯粹的超验没有事实支撑没有意义，纯粹的经验不具有普遍性也没有传播意义。二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范式。一般说，政治学要解决政治传播的内容问题，传播学要解决政治传播的形式问题，脱离了内容的形式与没有适当形式的内容，在政治传播中都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内容与形式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三是战略与策略相统一的范式。完备而有效的政治传播理论构建离不开战略与策略这两个相互依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战略着眼于宏观和未来考量，因而指导着策略，而策略着眼于微观和当下行动而支撑着战略。但是，对于政治传播的研究领域，却并不能机械地划分出哪些是属于战略部分哪些是属于策略部分，而是任何领域都有从战略与策略考量的必要和可能。四是理论与实证相统一的范式。这是目前政治传播研究范式暴露出来的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很多政治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议题陷入难以深入的方法论困境所在。具体表现在：重要的选题只是在理论的层面抽象地论证而没有实证实验数据的支持，相反，非常先进的实证和实验研究，却缺乏对选题意义的理论判断以及经过严密的实证实验研究之后的有效理论分析，进而使这种研究仅限于“看上去很美”。政治传播研究需要自觉而准确运用的研究范式还有很多，比如，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特殊与一般的统一、建构与解构相统一等。限于篇幅，我将另文专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的十大范式》。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

◇ 俞可平

政治传播的英文是“political communication”，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有三个词，首先翻译为“政治沟通”，还有一个翻译为“政治交往”，还有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政治传播”。现在“政治传播”成为热门话题。在政治学中，它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大众传播学意义上的政治沟通，也就是今天这个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政治信息的传播、民意的形成、舆论的导向、政治态度的变迁等；另一个就是信息论和控制论意义上的政治沟通，它主要讲的是把国家当成一个政治系统，在这个政治系统中政治信息是怎么流通的？

无论是哪一种意义上的政治沟通？对于社会的政治生活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政治沟通的意义更广泛一些，所以在此我更愿意把“political communication”译成“政治沟通”，只在特定场合下才译为“政治传播”。

美国有两位著名的政治学家，一位是阿尔蒙德，是西方比较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把政治沟通当成是“政府的血脉”。他说，人们“可以把这种沟通的功能与血液循环联系起来。它不是血液，但它拥有的就是滋养这个系统的东西。血液就是经由心脏静脉输送要求、抗议和需求的中间媒介；反映这些要求和需要的法规、规章和调节等输出从心脏经由动脉而流出”。简而言之，政治沟通对于政府的重要性，犹如血液流动对于人体的重要性一样。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政治学家叫卡尔·多伊奇，他把“political communication”当作是“政府的神经”。他有一本名著《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和控制的模式》（*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该书是20世纪美国政治学领域最有影响、写得最好的书籍之一。“political communication”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要把它当成政府的血脉和政府的神经呢？因为政治沟通包括政治传播，它对民主政治和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讨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息息相关。我们先来看看它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民主政治的基础是什么？是民意。民意就是民众的呼声、需求和民众的愿望。民主政治首先体现为政府一定要体现民意，政府的政策要反映民众的需求，满足民众的需求。但是政府怎么知道民众的需求？怎么样能够合理地、科学地来了解民意？

这就离不开政治沟通或者说政治传播。没有政治沟通,政府就无从了解民意;没有政治沟通,民众也无从了解政府和政府的官员。民主政治有两个最关键的环节,一个是授权环节,一个是限权环节。前者主要通过选举民主得以实现,后者主要通过协商民主得以实现。这两种民主都离不开政治沟通。如果没有候选人与选民的沟通,如果对候选人的情况一无所知,怎么样选出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呢?如果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不听取民众的意见,如果政府的政策老百姓一点都不知道,政府的政策怎么可能体现民众的需要呢?所以,没有政治沟通,就无从谈论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这是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讲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学把后者简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目标是什么呢?这就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决定里第一次出现的“善治”。从学术的概念来讲,“善治”就是公众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或者说是治理过程,也就是说利益相关方都觉得这个公共政策好。从政府和公民的关系来看,这个“善治”就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二者关系的最佳状态。用政治学术语来讲,就是官民共治。如果官民之间没有正常的沟通,何来官民共治呢?所以官民共治的前提也是政治沟通。

这么重要的政治沟通,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换言之,如何来改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今年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建设的指导性意见。协商民主就是官民共同来参与国家治理,这就必须考虑到如何改善政府与公民的沟通,或者说如何实现政治沟通的现代化。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势必相应地要求政府沟通的现代化,包括政治传播的现代化。从改善政府和公民的沟通,推进政治沟通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这么几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政府要有自觉的意识,把与民众的沟通当作是一种公共责任。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所有政府官员甚至全体公职人员都应当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密切与民众的联系,想方设法了解民众的需求和愿望,是政府和每个政府官员的一种基本职责。如果对民众的呼声充耳不闻,对民众的需求视而不见,那就是政府的失职。

第二,要尊重政治沟通的规律。无论是控制论意义上的政治沟通,还是传播学意义上的政治沟通,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例如,由上到下的决策指令信息和由下到上的决策效果反馈信息不能走同一条管道;有效的政治传播必须适应受众的需求,等等。

第三,政治沟通要制度化和规范化。政府要有适当的制度,使政府官员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与联系规范化。制度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要素,也同样适用于政治沟通的现代化。

第四,政治沟通要以疏为主。民意不能被阻塞、被扭曲。静态稳定通过抑制公民的言论和需求来维护现状,动态稳定通过释放并满足公民的合法需求来维护秩序。动态稳

定的基础是以疏为主的政治沟通,即让政治信息足够通畅地流动,特别是不能堵塞民众的言论和呼声。

第五,政府要努力拓宽沟通的渠道,推动公民合法地、有序地公共参与。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渠道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政府官员与民众的对话、座谈、互动、协商、咨询,以及政策听证、民意调查、政务公开、公民信访等,都是不同的政治沟通方式。不同的沟通管道和沟通往往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一定要充分发挥各种渠道的作用。

第六,政府要特别重视运用现代高科技的沟通手段。以网络信息为代表的高科技手段,正在颠覆包括政治沟通在内的传统政治行为方式,博客(Blog)、推特(Twitter)、脸谱(Facebook)、微博(MicroBlog)和微信(WeChat)每天都在制造种种政治事件,同时也在平息各种政治事件。政府要高度重视这些高科技网络工具,因势利导,发挥新媒体在政治沟通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强对改善管理,努力降低其消极作用。

第七,要注重政治沟通的实际效果。官员与民众沟通和联系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政府更加体现民众的需求和愿望,增进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因此,政府与民众的沟通要讲究实效,尽量避免形式主义。

第八,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和联系应当是平等的、理性的、合法的和文明的。沟通和联系是一种双方的互动行为,政府和民众是两个平行主体,必须相互平等、尊重和理性。政府当然不能居高临下,不能没有诚意,民众也同时要理性守法。民众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同样要合理合法,否则不仅政府无法满足这些要求,而且会增加双方的不信任。

总而言之,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息息相关。推进政治沟通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推动民主政治的进步,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